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014034423

B82-061

34

徐复观全集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九州出版社



北航

C1722689

B82-061

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徐复观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12

(徐复观全集)

ISBN 978-7-5108-2557-6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人性论—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B82-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323号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作 者 徐复观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6 开
插页印张 0.5
印 张 27.75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57-6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复观全集

中国人之思维方法

诗的原理

学术与政治之间

中国思想史论集

√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中国艺术精神

石涛之一研究

中国文学论集

两汉思想史（一）

两汉思想史（二）

两汉思想史（三）

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中国经学史的基础

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论知识分子

论文化（一）

论文化（二）

青年与教育

论文学

论艺术

偶思与随笔

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

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追怀



徐复观先生，1963年于东海大学家中

先生生先朝此書大甲之... 207
 德之符見趾於先朝曰死兵之... 204
 應歸之陽子居先朝曰... 245
 董生... 246
 西而不... 246

應字... 順... 244
 應字... 順... 244

復觀藏書

徐復觀先生手迹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六、《中国文学论集》

七、《两汉思想史》（一）

八、《两汉思想史》（二）

九、《两汉思想史》（三）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

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十四、《论知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

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湾。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海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 郭齐勇 谨志
薛顺雄 徐武军

《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由台中私立东海大学一九六三年四月初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一九六九年再版。

序

—

这里所刊行的《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是对“一般性的哲学思想史”而言，我所写的“以特定问题为中心”的中国哲学思想史的一部分；我的想法，没有一部像样的中国哲学思想史，^①便不可能解答当前文化上的许多迫切问题，有如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对现时中国乃至对现时世界，究竟有何意义；在世界文化中，究应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因为要解答上述的问题，首先要

① 近三十年来，有人以为西方哲学，是以知识为主。若以此作标准，便认为在中国历史中并无可以与之相对应的哲学；于是把原用的“中国哲学史”的名称，多改为“中国思想史”的名称。我觉得这是一种错误。西方的所谓“哲学”，因人、因时代，而其内容并不完全相同。希腊以知识为主的哲学，到了斯图噶学派（Stoic school），即变成以人生、道德为主的哲学。而现时哲学的趋向，除了所谓科学的哲学以外，也多转向人生价值等问题方面；则在中国文化主流中，对人生道德问题的探索，及其所得的结论，当然也可以称之为“哲学”。“思想史”的“思想”一语，含义太泛；所以我主张依然保留“哲学”一词，而称之为“哲学思想史”，以表示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在这一方面的成就，虽然由于知识的处理、建构有所不足，但其本质依然是“哲学的”。在原用的“哲学史”中加入“思想”一词，不是表示折衷，而是表示谨慎。等于说，中国历史中没有“政治学”，因为没有建立成一套组织严密的“学的”系统，但却有丰富的“政治思想”，而可以由我们的努力，把它拿来作“学的”建立，有如从铁矿中炼铁，从铁中炼钢一样。

解答中国文化“是什么”的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什么，不是枝枝节节地所能解答得了的。不过，因为近两百年来，治中国学问的人，多失掉了思想性及思考的能力，因而缺乏写一部好哲学思想史的先行条件；所以要出现一部合乎理想的哲学思想史，决非易事。于是，我想，是否在历史文化的丰富遗产中，先集中力量，作若干有系统的专题研究；由各专题的解决，以导向总问题的解决，会更近于实际？我之所以着手写人性论史，正由此一构想而来。这里所印出的是属于先秦阶段的。其中有的文献，虽可以断定是编成于秦代；但正如我在本书第十四章里所说，这些可以视作先秦思想的余波，所以我便一概称之为《先秦篇》。

人性论是以命（道）、性（德）、心、情、才（材）等名词所代表的观念、思想，为其内容的。人性论不仅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居于中国哲学思想史中的主干地位，并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原理、动力。^①要通过历史文化以了解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这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文化中其他的现象，尤其是宗教、文学、艺术，乃至一般礼俗、人生态度等，只有与此一问题关连在一起时，才能得到比较深刻而正确的解释。我国历史文化中的人文现象，有时会歧出于此一范畴之外；但这多属民族的自觉，因某些原因而暂归于堕退的时代，亦即是历史的发展，脱了轨的时代。历史的发展一旦恢复了正常，则由先秦所奠定的人性论，有如一个深广的磁场，它会重新吸引文化的各部门，使其环绕此一中心以展开其活动。这并不是说，我在此书里面，都

^① 请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第十四章是一个结论，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概论。所以读此书的人，最好先从第十四章看起。

直接解答了这些复杂的问题；而是说经过我的考查，发现这种密切的关连，乃是历史中的事实。在本篇中，对古代宗教，是如何向人性论演进，提出了相当详细的解答。尔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依然是由人性论的磁性所吸收而始完成了它的转向。我在《〈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的文学理论，虽然出现得较西方为迟；但作为此一理论中心的“人与文体”的关系，却较西方提出得早一千多年之久。这种情形，也只有在中国文学的一般文化背景上，即是在人性论的文化背景上，才可加以解释。而我国的艺术精神，则主要由庄子的人性论所启发出来的。这都是很显著的例子。

二

我认为中国哲学思想的产生，应当追溯到殷周之际，所以我便从周初写起。胡适认为《尚书》“无论如何，没有史料的价值”，^①这大概不是常识所能承认的，尤其是对其中的周初文献而言。先秦虽百家争鸣，但总应以儒、道、墨三家为主干。而站在人性论的立场，墨家却居于不重要的地位。本篇在次序的安排上，把儒家放在道家的前面，决不是像胡适说冯友兰一样的，“认孔子是开山老祖”，所以在“孔子之前，当然不应该有一个老子”。^②我对于冯友兰“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的说法，及胡适“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的说法，^③都完全不能了解。如冯所说，则孔子的思想，

① 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页二二。

② 同上，《台北版自记》。

③ 冯说见于其《中国哲学史》的页二九。胡说见于其《淮南王书》手稿本页十六。

难道真是“生而知之”？^①而孔子自称为“述而不作”的“述”，岂非全系诳语？我国古代思想中的《诗》、《书》、《礼》、《乐》，仁、义、礼、知、忠、孝、信等，在道家思想中并未加以肯定；而道家以虚、无为体的思想，亦为道家以前所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则胡氏的所谓“集大成”，到底作何解释呢？我之所以把儒家安排在道家前面，并一直叙述到《大学》为止，乃认为儒家思想是由对历史文化采取肯定的态度所发展下来的，道家则是采取否定的态度所发展下来的。先把由肯定态度所发展下来的思想，顺其发展的历程，加以叙述，这对于历史文化发展的线索，比较容易看得清楚。我在儒家与道家之间，加入了谈墨子的第十章，这是因为墨家在人性论方面的思想，相当的贫弱；并且儒道两家思想，在孔、老之后，皆有其自身之发展，但墨家的活动，虽大概延续到了战国末期，可是除了“别墨”对名学思想有所致力外，墨子本人的思想，在其后学中，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之迹；所以对先秦这一意义重大的学派，在本篇中只分给它短短一章的地位。这孤单的一章，由排列形式上的要求，只好把他安放在儒道二者之间，此外更无深意。

三

在我的研究休假一年中，把时间完全用在有关资料的阅读、抄录，及日本旅行方面去了。等到拿起笔来写的时候，则只能

^① 孔子当时，有人认为他是“生而知之”，这实际是来自传统的宗教意识。所谓“生而知之”，即认为孔子的知能，是出自“启示”。后人对此，似都无确切的解释。

利用授课的余闲。因为我教书的经验不够，必须做许多准备工作，所以这里的十四章正文，和三个附录，都是在时断时续的状态之下，作为一篇一篇的独立论文而写成的。这便不免于有互相重复，或前后照顾不到的地方。尤其是各章文字的不统一，虽经再三改正，总还留有一些痕迹。附录一是为了论断道家思想发展所不可少的考证工作。附录二不仅由对先秦若干文献的时代、解释等问题的澄清，而使先秦思想发展的线索，得以特别明显，并且为得要了解先秦与西汉，在文化思想上不同的性格，也提供了确切的根据。而附录三，经把辩论时不适当的辞句，加以删节后，只作为附录二的补充，才收入进去的。上面的文章，除了第十四章外，都曾在刊物上发表过。这一方面是为了希望能得到朋友的教正。更重要的是，经过了一些时候，再看自己已经刊出来的文章，在心理上，仿佛是完全处于一个负责的第三者的地位，才容易作进一步的思考与检证。所以已经刊出来的文章，除了三个附录，仅增入若干论证的材料，修正不多以外；其余的，都经过了详细的修正，乃至改写。在本篇以前，我所发表过的有关文章，有的观点与结论，和本书所说的，若有所出入，当然应以此书为准。愈是迫近到研究的对象，愈感到要把握住一个伟大的人格，及把握由一个伟大人格所流露出来的思想，该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我在研究过程中，虽然尽力要守住“不笑、不悲、不怒，只是理解”（*Non ridere, non lugere, neque detestari, sed intelligere*）的斯宾诺莎（*Spinoza, 1632—1677*）的格言；但常常感到站在研究的对象面前，自己智能的渺小。所以在本书中，不仅因题目的限制，以致有许多重要方面，完全略过了。即在用力写到了的范围之内，恐怕也有不周到、不深切的地方。我

想，这只有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写若干专文弥补。更希望能得到学术上的有力批评。

四

我对于材料的批判和解释，有的和传统乃至时下的许多说法，并不相同。但可以负责地说一句，我既不曾有预定的立场，更无心标高立异；而只是看了许多有关的说法以后，经过自己的批判，顺着材料的本身，选择一条心之所安的道路。我的批判能力，当然是有限的。但我断没有不经过一番批判，而随便采一说，建一义的。其中，应当有许多对比的讨论，而始易明了其是非得失之所在。但这样作下去，那将显得非常枝蔓。并且有许多说法，在今日看起来，并不需要去批评。所以我只对于有代表性或有影响力的不同意见，间或加以讨论。不过，我在这里应当郑重声明一句，我对于中、日两国时下学人有关的著作所提出的讨论，和我对于朱元晦、王阳明所提出的讨论，完全是出于同样的态度。有的地方我批评了朱元晦、王阳明，但决不曾减少我对这两位大儒的敬意；而这两位大儒在学术上的地位，也决不会因我的批评而受丝毫损失。我年来渐渐了解，一个人在学术上的价值，不仅应由他研究的成果来决定，同时也要由他对学问的诚意及其品格之如何而加以决定。学问是为人而存在；但就治学的个人来说，有时也应感到人是为学问而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希望对“知识的积累”，能有一点贡献。自己的话说对了，这固然是一分贡献；能证明自己的话说错了，依然是一分贡献。当我写《中

国孝道思想的形成、演变及其在历史中的诸问题》一文^①时，推断《孝经》是成篇于西汉武昭之际。友人牟润孙先生来信，认为我把时间推断得太后；我当时并未能接受。但经过这几年随时留心的结果，发现牟先生的话是正确的。我一面感谢牟先生的启发，使我经过一段时间后能发现自己的错误；同时，也感到由此一错误的发现，而能使我那篇文章更为完整。中国两百年来在学术上的落后，不仅是铁的事实；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一天一天地增加。即以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而论，我原以为两百年来，虽然很少值得称为有系统的知识的探究；但在训诂、考证方面，总应该有可供利用的基础，尤其是在倡导科学方法之后。但这几年我渐渐发现，连这一方面的工作，也多是空中楼阁。许多考据的文章，岂特不能把握问题的背景；最令人骇异的是，连对有关资料的文句，也常缺乏起码的解释能力。甚至由门户、意气、现实利害之私，竟不惜用种种方法，诱迫下一代的优秀青年，在许多特定势力范围之内，作“错误累积”的工作，以维护若干人在学术上的地位。假使有青年想凭自己独立的意志去追求真是真非，便很难有插足学术研究机关的机会。因此，我们这一代乃至比我们更上一代，研究中国学问的人，除了其中极少数的人以外，岂仅在学术上完全交了白卷，实际还在率下一代的人去背弃学术。因此，我恳切呼吁已经在学术界中取得了一些地位的先生们，要有学术的良心，要有学术的诚意，要向下一代敞开学术研究之门；这是我们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有的良心上的赎罪。我再进一步说一句话吧！站在人类文化的立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排斥对历史

① 此文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中。